

我的崎岖的语言学之路 —— 代跋

说来惭愧，这本仅约十万字的《概要》，要算是我四十年的语言研究的汇报。

我生长在一个家无半本书的普通人家里。少年时读书不用功，又没人督促和鼓励，连中学也没能念完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听人家谈起钱学森的事迹后，才发奋读书。1959年以自修生名义考进香港大学，在那里一混就是七年。我先进修中文，虽得了个学位，但自问脑袋里还是“空空如也”，因此申请在英语系再多念一个学士学位。当时大学当局，以没有先例为借口，拒绝我的申请。后来格林青（Alan W. T. Green）教授为我力争，才获批准。他还为我一个人开了三门新课：古英语、中古英语和语言学。那时候，香港只有一所大学，开设语言学课也是个新尝试。我就这样走进了语言学这个大观园。

格林青教授不是语言学家。他在伦敦大学念的是英国语文和古英语。他的语言学课的教材主要是根据 Charles Hockett 1958年出版的 *A course in modern linguistics*。他很谦逊和坦率地跟我说：“Hockett 这本书有很多地方我也不大明白，我们俩就一起学习吧。”接着，我继续跟他念硕士，论文题目是 *A study of the functions and of the presentations of Cantonese sentence particles*（1965）。写这篇论文我费了两年多的时间。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，我先策划一个特定的语境录取 15 个小时中学生的现场对话，然后讨论其中的语助词在句子层次上的内涵意义（*sentential connotations*）。有关这次调查的过程和所获得的大量语助词及其分析，可参见该论文的缩本《香港粤语的语助词》，《方言》1980年第一期，第 35-52 页。

三年后（1968年），我拿到了法国奖学金到巴黎继续学习。那时我已年过三十。我还记得第一次跟当时巴黎汉语研究所所长李嘉乐教授（Alexis Rygaloff）见面时，他不客气地说了一句：“你来得有点晚了”。是的，他的一个得意学生在美国麻省拿到博士学位时，才廿六、七岁。他说的是实话，我觉得很难受，但亦无言以对，只得把苦水往肚子里咽。用我家乡的话来形容，他这句话是“从背脊骨落”下去的。事情还没完。因为我香港那位导师的名字不见经传，李嘉乐教授对我的论文的质量也有点怀疑，好在我那论文的校外主考 Michael Halliday 在欧洲颇有声望，看在 Halliday 的分上，他才抽空看我的论文。这次会晤颇触动了我的自尊心。

那时候，乔姆斯基的生成学派正如日中天，影响力早就扩展到法国。法国语言学界，好些人已跟上这个大西洋彼岸的潮流，但一般都采取观望态度。七十年代初。Robert Lees 教授正好在巴黎任客座教授，我跟他结了个忘年交。他是乔姆斯基派少数主力人物之一。可是听了他的课，使我觉得他们这一派的研究主旨和我的思想格格不入，结果是三过其门而不入，仍另找别的蹊径去了（参见本册《导言》）。说真的，那时候，语言学尚未深深地吸引我，而且我刚受聘法国国家科学中心，隶属中东、远东文化组，我的直接领导是汉学家谢和耐教授（Jacques Gernet），因此，我的研究重点也并非普通语言学（转到语言学组是几年后的事），所以，当时对语言学这门学科，我还是若即若离，飘泊无定。以致在第一篇博士论文的《后记》里，我竟用否定语气写了一段背离语言学常规的话。下面是这段话的中文原文：“窃以为无有究竟，早溯老庄。有生于无，李耳阐道，是非莫辨，庄周齐物。形上虚玄，蔚然大观。公羊解诂，不弗析离，何休作俑。今谈否定，无出于有，自桧之论定矣。嗟乎，自然不在，空灵顿失……知才之不逮也，敢妄越无中生有之境！”（见拙著 *Le système de la négation en cantonais*, 1980《后记》）事隔多年后，有一天，我在校门碰上我这篇论文的导师，Antoine Culioli 教授，他对我说：“你论文的《后记》是什么意思？”他的口气，是介乎惊讶和不满之间。他要说的，其实是“你怎么搞的！”

我对乔姆斯基派学说持保留态度的另一原因，是有鉴于欧美语言学派的纷争，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这让我这个从没受过欧美语言学系统训练的后学倍感一时无所适从。最后还是对手语的兴趣，把我引到语言的共性词序和语言起源的研究上去。这个抉择很符合我着重借助田野调查工作以获取第一手资料的愿望。回想几年后到加拿大印第安人保留区和中国农村“半落户”时的心情，用辛弃疾《鹧鸪天》里的两句来描写倒是蛮贴切的：“城中桃李愁风雨，春在溪头荠菜花”。

从 1977 年到 1980 年，我跑遍了散布在加拿大各省北部的保留区，终于在魁北克省找到一位理想的“离群”聋人母亲——玛尔大·比蒂贵（Martha Pettikwi）女士。请容许我再引另一首辛词来表达这次偶遇带来的喜悦：“众里寻他〔她〕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！”1980 年广州聋校又给我介绍了黄埔四代聋人同堂的郝伯家。有了比蒂贵和郝伯家这两处聋人提供的宝贵语料，我遂能完善我在

1983年提出的视觉语言学的构思，结束了自1972年至1987年的离群聋人自创手语田野调查工作，并于1988年以这个调查报告取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头衔。

我很喜欢作这样的一个比喻：人的脑袋像片耕地，要是在这块土地上老种土豆，土豆就会退化的。这个想法，促使我在长达十五年的田野调查告一段落后，就顺藤摸瓜，开始寻找新的课题。所以九十年代后，我就开始致力于视觉语言学在古汉字、中国古代体态语、比较意符学、中国视觉世界等领域中的开拓工作。然而，想把视觉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和运作介绍给国内读者这个心愿，仍一直萦系心头。几年前，江蓝生教授到我所访问，言谈间，她鼓励我把这个心愿付诸实践。可是起草了两三章后，这个计划又给别的事情打断了。意料不到的，是去年夏天那场病却催生了这本书。在动手术前我下了决心，一定要先了却心头这件事，因为我往后的日子，完全操纵在大夫们的手里。《视觉语言学概要》全稿甫定，我就马上寄给复旦大学徐志民教授校订。志民兄刚为我校订了《概要》的姐妹篇《手势创造与语言起源》，又得马不停蹄地校对这本小书。在一校，再校过程中，他作了很仔细的订正和补漏。在我极困难的时刻，他总是二话不说，答应帮忙。对这样的一位知己，我要表示由衷的感谢。

定稿后，北京语言所江蓝生教授在百忙中给我写了一篇长序，让国内的读者对我这个陌生的名字，有个初步的印象。蓝生兄是能见证和领会我撰写这本拙著的动机的唯一朋友，她的鼓励，也是这本书终能付梓的一股动力。她的盛情，她的督促，对本书出版的关怀，这一切，我都铭志在心。

《概要》行将付梓时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原所长、《当代语言学》主编沈家煊教授也拨冗赐序。家煊兄是久违了近三十年的旧友。他的研究领域很广泛，包括拙作所牵涉到的语言共性、语言类型和认知语法等问题。在我心目中，毫无疑问，他是评价《概要》最理想的人选。江、沈两位的序互为补充，前者刻画我这项研究的心理历程，后者指正我在这项研究过程中的描述和分析。这里，我向他们遥寄我深深的谢意。

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麦里筱（*Chrystelle Maréchal*）学弟也为本书出了不少力。她为我审查和扫描了书中所引用的全部古汉字。此外，她还很小心地为我校订了参考书目。这些吃力而不见痕迹的工作，她都默默地为我承担。谢谢了，小麦。

我没有忘记商务印书馆的责任编辑何瑛女士 2008 年的来信，说她正准备为我报送“选题单”，可是我四年后才把稿件发给她！她不但没责怪我，而且没几个月就完成了书稿的编辑工作。我除了向她道谢，还要请她原谅我的撰写计划的一拖再拖。

游顺钊 2013 年 3 月 15 日 于巴黎